

北京与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资源优势之比较研究

李红梅, 任锦华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被称为“21 世纪的最后一桶金”, 被世界各地高度关注并将其作为新的产业增长点。北京与台湾具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优势,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对比分析两地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劣, 找出客观存在的竞争性与互补性, 特别是人力资源优势、文化资源优势、管理优势等, 结合文化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重点分析北京与台湾文化创意人力资源要素的独特优势, 找出对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启迪及双方合作的接合点。对比发现, 北京的“文化软实力”中的部分指标排名低于台北, 但高于台湾其他城市, 优势各异, 表明双方在创意产业合作方面有较大空间。

关键词:文化资源; 人力资源; 管理资源; 文化硬实力; 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 G322.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772/j.issn.1009-8623.2015.10.007

1 引言

“北京文化产业”一词首次出现于 1996 年北京市制定的《关于加快北京市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为应对北京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1997 年北京市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目标, 2005 年正式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并于 2006 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 将文化创意产业列为北京的工作重点。在台湾, 面对工业化转型所产生的城乡失衡状态, 1994 年地方行政部门提出了“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并正式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设想。2002 年, 台湾核定通过“挑战 2008”: 台湾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 “文化创意产业”首次被正式列入台湾整体发展规划之中, 且处于优先位置。^[1]2010 年, 台湾颁布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以促进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 两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均取得了快速发展, 成效显著。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虽晚, 但发展迅速, 已成为仅次于金融产业的第二大经济支柱。2006 至

2013 年间,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年增加值逐年递增, 增长率一直处于 9% 以上, 其增加值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12% 以上, 2013 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 2 014.7 亿元, 占到了地方生产总值的 12.3%。2014 年,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2 794.3 亿元, 占全市 GDP 的比重提高到 13.1%, 创历史新高。截至 2014 年底, 北京市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已达 17.1 万户, 同比增长 15.8%; 注册资本 4 338.5 亿元, 同比增长 39.4%。规模以上法人单位实现收入 11 029 亿元, 同比增长 9.5%; 从业人员 109.7 万人, 同比增长 2.2%。在整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增速换挡的形势下,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逆势上扬, 表现出较强的抗衰性。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兴起较早, 但与北京相比,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年营业额较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 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2009 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营业额下降, 2010 年、2011 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营业额逐步回升, 2012 年受国际景气走缓影响营业额又再次下降, 随着欧美经济复苏, 2013 年营业额上升, 但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营业额与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为平稳, 一直维持在 5%

第一作者简介: 李红梅(1963—), 女,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关系与产业结构。

收稿日期: 2015-07-03

左右。^①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各次产业规模相差较大，其中广告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工艺产业和产品设计产业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中具有规模优势；数字内容产业和广播电视产业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贡献度^②较大，最能带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2]

北京与台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各异，现从文化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资源三方面对北京、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资源优势进行比较分析。

2 北京与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文化资源优势比较

文化是历史和艺术的沉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根基，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先天优势。以下分别对北京、台湾的文化资源优势进行对比。

2.1 传统文化资源优势比较

受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历史发展轨迹的影响，北京与台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既有某些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是两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根基。

2.1.1 北京传统文化资源优势显著

——底蕴丰厚的历史古都。北京悠久的历史积淀成为当今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资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厚重基础。作为历史古都，北京具有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拥有世界级文化遗产7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8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57个。北京普通居民居住的四合院和各式胡同更是北京底蕴深厚、特色显著的靓丽风景，是传统居住文化的一大特色，承载着历史悠久的老北京文化。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资源是北京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北京传统文化的精髓。截至2013年，北京已有12000多个项目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有108项，列入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有235项。昆曲、京剧、北京抖空竹、景泰蓝工艺、雕漆工艺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精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并被传承下来的，它是历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2.1.2 台湾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呈现多元化态势

受地理、历史、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台湾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显著特征。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台湾在历史上曾遭受西班牙、荷兰和日本的殖民统治。这期间，台湾本土文化受到了殖民地文化的极大影响。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大陆固有的传统文化以及各地的文化相继聚集到了台湾，从而形成了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四大族群，在台湾闽南人约占73%、外省人约占13%、客家人约占12%、原住民约占2%。四大族群都具有自身的传统民俗文化和技艺，如闽南人的妈祖绕境、烧王船和客家人的苗栗陶瓷、采茶戏等。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和技艺，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同时台湾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的地区，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统治将基督教和天主教传入台湾，大陆移民将佛教和道教带入台湾，因此，在台湾分布着众多的寺院、教堂，这些寺院和教堂代表着台湾传统的宗教文化，成为台湾的一大文化特色。

2.2 现代文化资源优势比较

城市是链接历史、现代与未来，具有一致性、多元性、交融性的空间集聚体。客观地看，城市文化资源应该是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资源的并存与融合，一个地区不仅应具有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具备独特的现代文化资源。

北京不仅是一座历史名城，而且也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其现代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北京拥有国家大剧院、水立方等现代化建筑，鸟巢、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北京当代万国城被入选为2007年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具备丰富的广播影视资源，中影基地、星光影视园这类全国领先的电影

① 数据来源：《2013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报》。

② 贡献度是将营业额对前一期变动率依照次产业分类拆解的一种指标，把各次产业的年成长率乘以该次产业前一期营业额占比，所得数字即为该次产业对整体文化创意产业成长率的贡献度。贡献度指标可以提供解答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成长的主力为哪一项次产业。由于现阶段数位内容产业归属于其他产业，无法将其与其他产业进行对比，因此可以从贡献度角度可以看出其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地位。

生产和电视节目制作工厂均在北京；除此之外，其现代娱乐休闲场所也十分丰富，拥有 798 艺术区、糖果俱乐部、三里屯酒吧等众多现代娱乐休闲场所。

在台湾不同地区根据自身的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城市文化。台北作为台湾省的经济、文化中心具有丰富的现代文化资源，在流行音乐及娱乐方面的优势突出，2014 年台北正式成为国际工业设计协会 2016 年的“世界设计之都”，这也充分展现了台北在现代设计方面的优势。高雄是台湾的工业港口城市，其根据自身所具备的工业城市特点，以“水和光的特色”来营造城市意向，兴建和开发了一批新的都市文化景象，并且成功举办了突出城市产业特色的国际货柜艺术节和国际钢雕艺术节。台中是以文学艺术产业为中心的城市，正朝着“国际文化城”方向发展。

北京和台湾在自身所具备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与国际接轨，积极发展现代文化，成为集历史与现代为一体的国际大都市，两者所具备的丰富各异的文化资源成为两者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宝贵财富。

3 北京与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优势比较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源竞争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2013 年，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出版了《2013 两岸 42 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调查报告》，该报告在多项指标排名中均涉及到了人才的竞争。本文主要依据《2013 两岸 42 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调查报告》，对北京和台湾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进行对比分析。

3.1 两力模型及其应用

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出版的《2013 两岸 42 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调查报告》采用“两力模型——文化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①”评估横面，对我国 42 个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进行了详细分析。该报告中的“文化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根据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教授 Joseph Nye 在《注定领导》一书中提出的“硬实力”和“软

实力”以及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对国家竞争力进行评估时所使用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推导而来，并根据各种相关研究报告确定了其“文化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横面构成。Joseph Nye 在《注定领导》一书中提出“一国之综合国力可分为‘硬实力’（指的是一国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等）、‘软实力’（指的是一国文化影响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依然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IMD 对国家竞争力进行评估时，将“经济表现”和“基础设施建设”归纳为“硬实力”，其主要是由经济数据加以评估，如成长率、失业率等；而将“企业效能”和“政府效能”归纳为“软实力”，其主要依据普遍性的社会认知及客观数据加以评分，如贪腐程度、金融机构透明度等。^[1]依据以上论述，本文将“硬实力”与“软实力”应用到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的分析上，即设定“文化创意产业硬实力”与“文化创意产业软实力”用于分析北京、台湾的人力资源的优势。文化创意产业的特殊性在于文化创意产业表现为社会创造肌体的一项产业化运动和产业化过程，既是“硬实力”（经济效益价值），同时又是“软实力”（精神文化及政治意义）。

3.2 北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硬实力之比较

依据《2013 两岸 42 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调查报告》中“文化硬实力”指标的设定，从教育支出水平和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状况两个指标对北京、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硬实力进行比较分析。

教育支出水平反映了政府对人力资源培养的投资水平，教育支出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及优劣。北京的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 13.1%，低于台湾 20.18% 的水平，成为制约人力资源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状况是表现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优势上的基本评价指标，由于北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包含的产业范围不同，其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数目及其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存在明显差异，在此仅考察北京、台湾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状况。北京第三产业

①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表 1 北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硬实力

| 地区 | 教育支出水平 | | 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状况 | | | |
|----|-----------------|--------------|------------------|------------------|--------------------|------------------|
| | 教育支出经费 (万美元) | 占财政支 出的比重 | 第三产业从业人 员数(人) | 占总就业人口 的比重(%) | 文化创意产业从 业人员数(人) | 占总就业人 口的比重(%) |
| 北京 | 8 598 436.5 | 13.1% | 8 374 000 | 75.63 | 1 529 000 | 13.80 |
| 台湾 | 1 000 160.7 | 20.18% | 6 380 000 | 58.74 | 172 757 | 1.59 |

数据来源：《2013 年北京统计年鉴》《2013 年台湾统计年鉴》

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 75.63%，台湾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 58.74%，可以看出，北京第三产业在人力资源数量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3.3 北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软实力比较

《2013 两岸 42 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调查报告》根据相关研究报告确定了文化软实力的 20 个细项横面，其主要包括“体制支持”、“文化包容”、“人本价值”和“文化辐射”等。其中“人本价值”包括“居民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开创”、“居民对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重视”、“重视与吸引国际文化创意人才投入”、“培养或育成文化创意产业专业人才的机构”以及“复合性文化创意人才充沛”5 项指标，其在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决定因素的同时更是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软实力的决定因素，本文引用该报告中的“人本价值”，将其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软实力的一项指标。此外，“体制支持”中有 4 项指标涉及到人才培养体制，包括“文化教育体制完备”、“积极培育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文创推动机构对文创业者辅导协助”以及“文化创意

人才引进机制完善”，因此“体制支持”对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软实力有重要支撑作用，是衡量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软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以下通过“人本价值”和“人才培养体制支持”两项指标对北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软实力进行比较分析。

3.3.1 北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本价值”

表 2 为北京与台湾主要城市有关人本价值各细项横面的排名，可以看出台北在“居民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开创”、“居民对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重视”、“重视与吸引国际文化创意人才投入”、“培养或育成文化创意产业专业人才的机构”以及“复合性文化创意人才充沛”5 项指标中均排名第 1，高于北京。北京在 5 项细项指标排名中位居第 2，高于嘉义、新北、新竹、高雄、台南和台中地区。在人本价值方面，北京居台北之后、优于嘉义、新北、新竹、高雄、台南和台中，这表明北京居民的创新性以及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度依然不是很高，北京对国际人才的吸引以及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也存在不足。但若将台湾看作一个整体，对台湾各主

表 2 北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本价值”各细项情况

| 城市 | 居民勇于尝试 新鲜事物开创 | | 居民对文化创 意产业知识产 权重视 | | 重视与吸引国 际文化创意人 才投入 | | 培养或育成文 化创意产业专 业人才的机构 | | 复合性文化创 意人才充沛 | | 人本价值横面 平均 | |
|----|------------------|----|-------------------------|----|-------------------------|----|----------------------------|----|-----------------|----|--------------|----|
| | 平均 | 排名 | 平均 | 排名 | 平均 | 排名 | 平均 | 排名 | 平均 | 排名 | 平均 | 排名 |
| 台北 | 3.958 | 1 | 3.748 | 1 | 3.815 | 1 | 3.653 | 1 | 3.731 | 1 | 3.781 | 1 |
| 北京 | 3.805 | 2 | 3.354 | 2 | 3.811 | 2 | 3.628 | 2 | 3.659 | 2 | 3.651 | 2 |
| 嘉义 | 3.606 | 4 | 3.061 | 5 | 3.424 | 4 | 3.303 | 4 | 3.394 | 3 | 3.358 | 3 |
| 新北 | 3.590 | 5 | 3.066 | 4 | 3.279 | 8 | 3.508 | 3 | 3.311 | 5 | 3.351 | 4 |
| 新竹 | 3.576 | 6 | 3.000 | 7 | 3.485 | 3 | 3.242 | 6 | 3.121 | 8 | 3.285 | 5 |
| 高雄 | 3.674 | 3 | 2.884 | 8 | 3.395 | 5 | 3.279 | 5 | 3.163 | 6 | 3.279 | 6 |
| 台南 | 3.424 | 8 | 3.061 | 6 | 3.364 | 6 | 3.212 | 7 | 3.333 | 4 | 3.279 | 7 |
| 台中 | 3.588 | 7 | 3.216 | 3 | 3.314 | 7 | 3.137 | 8 | 3.137 | 7 | 3.278 | 8 |

数据来源：《2013 两岸 42 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调查报告》。

要城市各细项指标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其各项指标得分数值均低于北京。

3.3.2 北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体制支持”

文化创意产业体制是否完善,会直接影响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此《2013 两岸 42 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调查报告》将“体制支持”作为衡量文化创意产业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表 4 对北京及台湾各主要城市“人才培养体制支持”各细项及平均细项值进行了排名,北京“体制支持细项平均值”最高,因此从总体比较上看,北京在人才培养体制上具有优势。

北京以及台湾各地在“文化教育体制完备”与

“积极培育文化创意人才”两方面排名一致,其分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北京、台北、台中、新北、高雄、台南、新竹、嘉义。可见,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教育体制完备”与“积极培育文化创意人才”方面要比台湾各地具有优势。对于“文创推动机制对文化创业者辅导协助”以及“文化创意人才引进机制完善”方面,北京排名第 2,低于新北,高于台湾其他城市,北京应借鉴、学习新北市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创业者辅导协助机制以及人才引进机制的经验,推动对文化创意产业创业者辅导协助机制以及完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引进机制。

根据前述分析可见,北京在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硬实力上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北京文化创意产

表 3 北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体制支持”情况

| 城市 | 文化教育体制完备 | | 积极培育文化创意产业人才 | | 文创推动机制对文化创业者辅导协助 | | 文化创意人才引进机制完善 | | 体制支持细项平均值 | |
|----|----------|----|--------------|----|------------------|----|--------------|----|-----------|----|
| | 平均 | 排名 | 平均 | 排名 | 平均 | 排名 | 平均 | 排名 | 平均 | 排名 |
| 北京 | 4.126 | 01 | 3.916 | 01 | 3.645 | 02 | 3.551 | 02 | 3.810 | 01 |
| 台北 | 3.926 | 02 | 3.692 | 02 | 3.562 | 03 | 3.375 | 03 | 3.639 | 02 |
| 新北 | 3.262 | 04 | 3.230 | 04 | 3.836 | 01 | 3.689 | 01 | 3.504 | 03 |
| 台中 | 3.412 | 03 | 3.431 | 03 | 3.196 | 08 | 3.333 | 04 | 3.343 | 04 |
| 高雄 | 3.186 | 05 | 3.209 | 05 | 3.512 | 04 | 3.279 | 05 | 3.297 | 05 |
| 台南 | 3.182 | 06 | 3.152 | 06 | 3.212 | 07 | 3.129 | 06 | 3.169 | 06 |
| 新竹 | 3.121 | 07 | 3.121 | 07 | 3.323 | 05 | 2.935 | 08 | 3.125 | 07 |
| 嘉义 | 3.030 | 08 | 3.000 | 08 | 3.212 | 06 | 3.000 | 07 | 3.061 | 08 |

数据来源:《2013 两岸 42 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调查报告》。

业从业人员较多,在人力数量上具有优势;在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软实力方面,北京的人才培养体制较为完善,在人才培养体制上具有优势。北京存在的不足:首先是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整体低于台湾,这不利于北京对人才的培养;其次,在“人本价值”具体细项指标上,居民的创新性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创新人才吸引、培育人才的机构以及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相对处于不利地位,这些构成了北京在“人本价值”上的劣势,由此影响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人力资源软实力,进而影响创意设计人才的培养以及创新设计成果的产生。

4 北京与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管理资源优势比较

管理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又一重要资源,好

的管理可以提高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早,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规范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管理体制尚处于不断的改革之中,管理方面的经验有待进一步积累和改进。

4.1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管理的基本特点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政府职能扩大势必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尽管政府正在降低门槛、放宽限制,但现阶段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仍然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管理特点,政府主导、规划的现象依然存在,重行政手段缺法律约束。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管理经过多年的改革调整,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与民间文化企业管

理的失衡

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政府应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和产业配套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构建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4]但目前，政府在对文化企业的管理上出现了国有企业与民间企业管理的失衡。政府过多的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进行微观上的指导和干预，直接设定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目标任务、管理国有文化单位的运作，甚至直接干预国有文化单位人事任免。这使得国有文化企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部门，抑制了国有文化单位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使其缺乏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国有文化单位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脱节。但政府对民间资本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大型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对某些行业的垄断经营，使民间资本无法进入该领域。政府的资金扶持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补贴等各项政策均向国有文化企业和大型企业倾斜，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和民间文化企业的发展。^[5]

(2) 政府主导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

政府主导、组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在政府主导下，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正在逐步转变为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

“十一五”以来，市政府主导建立了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但产业聚集区只能在产业起步阶段推动该产业的快速发展，在产业发展壮大后，聚集区难以适应更加复杂的产业分工需求。^[6]受发展体制、机制等因素的限制，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限制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管理体制不畅、保障系统不健全、政策有效性不强、区域发展不平衡等。^[7]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13年，北京市政府提出规划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的计划。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由“集聚区”转变为“功能区”的同时，政府的管理方式也由政府单点政策措施向“共性+个性”的差异化功能区政策保障体系转变，由政府扶持逐步转变为市场主导。^[8]

4.2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管理的优势与特色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初是由“社区总体营造政策”推动，起源于社区，后在全岛得以迅速拓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营运模式。从营造适合居住的文化氛围开始逐步发展成为文化创意产业，

这种“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在台湾创意产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三位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管理体制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台湾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团体以及企业“三位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管理体系，为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台湾行政管理部门在文化创意产业管理体系中通过制定各项政策和法律条文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管理和经营进行调控和规范。社会团体为政策的实施、企业间的交流合作以及产官学的结合提供了高效的平台，台湾具有许多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如艺术文化环境改造协会、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表演艺术联盟等，这些组织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企业的管理则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台湾文创企业具有较多的自主权，在行政部门及社会团体的辅导协助下，企业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的经营管理模式，同行政部门、民间团体共同推进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三者共同构成台湾“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

(2) 适宜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经营管理模式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在“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下，形成了较为灵活的经营管理模式，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经营和管理上。台湾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经营管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公办公营，另一种则是公办民营，且公办民营有三种不同的营运方式：即BOT（Build-Operate-Transfer）、OT（Operate-Transfer）、ROT（Rent-Operate-Transfer）。台湾根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经营管理模式。1999年台湾统一棒球队公司就以BOT方式投资于台南棒球场，华山创意文化园区早期曾以OT方式进行经营管理，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由“文建会”2002年接手后采用公办公营管理模式。随着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对各产业园区逐步采取ROT模式进行管理，除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外其余4个园区均以ROT方式将其经营管理权交与民间资本。

台湾民间资本充分介入产业园区的管理经营，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市场作用，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鼓励企业创新，进而使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获得充分发展。

5 结论

由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与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优势各异,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引进对方的优势产业,不仅可以带动本地相对弱势产业的发展而且也可扩大自身优势产业的市场;北京历史文化悠久,台湾文化呈多元化态势,具有相同和不同文化底蕴和特色的文创产业各显优势又相得益彰。北京与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具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台湾文创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行政管理部、社会团体以及企业“三位一体”的文创产业管理体系,以及公办公营、公办民营等灵活多样的管理运营模式,值得北京借鉴。依据“两力模型”对两地的人力资源优势进行分析发现,在硬实力方面,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上具有比较优势,台湾在教育支出水平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北京具有完善的人才培养体制,台湾具有丰富的国际人才、复合型人才,居民的创新意识、产权保护意识强。可见,提升两地的文化创意产业软实力,将为两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参考文献:

- [1] 巍然.台湾文化产业论稿[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25.
- [2] 台湾文化部.2013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报[R].台北:文化部,2013.12:20.
- [3] 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2011两岸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调查报[R].台北: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2011.03:222.
- [4] 范玉刚.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探究[N].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3-01(33).
- [5] 花建等.文化魔戒: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奥秘[M].台北:台湾帝国文化出版社,2005.
- [6] Florida R. .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How it is Transforming Working,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7] 董鸿英,张铮.“功能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模式的新探索[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04-01:102.
- [8] 黄斌,陈伟,孙莉.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分析[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04-01:163.

Comparative Study on Beijing and Taiwan's Resource Advantages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LI Hong-Mei, REN Jin-Hua

(College of Econom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which is called “first pot of gold at the end of the 21st century” gains high atten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s becoming a new growth engine. Because of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in developing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Beijing and Taiwan create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ls in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Through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resource advantages about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between Beijing and Taiwan, authors explore that there exist competitions and complementarities in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resources between them, especially in advantages of human resources, culture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resources. Combining with “cultural hard power”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authors focus on Beijing and Taiwan's unique advantages in human resources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conjunc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Taiwan, and the inspiration of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for Beijing. Authors find that Beijing's rank is lower than Taipei but higher than other cities of Taiwan in some “cultural soft power” indicators, and indicate both of them have distinctive advantages and have more cooperative space in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Key words: culture resource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resources; cultural hard power; cultural soft power